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8辑

邓稼先小传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法国巴黎

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8辑

邓稼先小传

郑坚坚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邱江生

封面设计 章 雯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8辑

邓稼先小传

郑坚坚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70 印张 1100 千字

1997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*

ISBN7-80521-850-1/K·120

定价：80 元（全 20 册）

目 录

一、故乡	(1)
二、古都	(6)
三、流离	(19)
四、回归	(30)
五、变奏	(48)
六、红云	(68)
七、狂飙	(79)
八、“福将”	(90)
九、尽瘁	(98)

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，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。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，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。

——张爱萍

一、故乡

汹涌澎湃，奔腾不息的万里长江，流经中原安徽的西南一隅，在她的左岸留下了一片富饶而繁华的土地。

这个地方，在古代被称为皖国，后来取名安庆。清代设置安徽省，便是取当时的安庆、徽州二府的首字而得省名。而皖，则成了安徽的简称。旧时的安庆府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安庆地区，包括安庆、桐城、怀宁、潜山、枞阳、太湖等县市。首府安庆，滨江而立，过去曾长期作为安徽的省会，如今依然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商埠。

安庆之于安徽在全国最为扬名的地方，恐怕还要数她在文化史和革命史上的那些著名的事件与人物：像清代的桐城派古文及其代表人物方苞、姚鼐，清末志士徐锡麟，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，小

说大王张恨水，“徽班”晋京，京剧鼻祖程长庚以及方兴未艾的黄梅戏等等。

如今，在这片曾孕育过美文与国剧的土地上，又出现了一个杰出的名字，尽管他在生前还并不怎么著名。甚至，说得确切些，他的一生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是在隐姓埋名中度过的。

出安庆城往北，约三十公里左右，地处怀宁县东部大龙山麓，怀宁、桐城边界，有一个普通的山村：怀宁县五横乡白麟畈的邓家大屋。但见阡陌之上，绿荫之中，有三五老屋掩映其间，黑瓦白墙，暮霭晨烟，野趣乡情……七十三年前的1924年6月20日（农历五月十九日），当代杰出的物理学家、核科学家，我国核武器研制的奠基与开拓者之一，也是主要的组织与领导者之一的邓稼先就诞生在这里。

白麟畈属于典型的皖南丘陵地带。邓家大屋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。山虽不高，水虽不深，却俱有名。山曰龙山、麟峰、龟山，水曰风水。麟、凤、龙、龟，古称四灵。于是有吟者诵道：“家在四灵山水间”，“家在龙山风水”。这位吟者，并非神仙或传说中的人物，而恰是邓稼先的一位高祖：清代著名的书法与篆刻大师邓石如（1743—

1805)，邓稼先是他的六世嫡孙。

邓氏为白麟畈的大姓，最初于元、明之际由江西迁徙而来，至邓稼先已是第十八代。查邓氏宗谱，其中高官厚禄者甚寡，而通经达史、工诗古文之士则代有相传。尤其书画篆刻，是为专长。这当中最著名的，自然要数那位“江南高士”邓石如了。石如初名琰，字石如，号顽伯，以喻“不贪赃，不低头，不逢迎。人如顽石，一尘不染”之志。后避清仁宗颙琰（嘉庆帝）讳，改以字行。更字为顽伯，号完白，完白山人、完白山民、龙山樵长、风水渔长、笈游道人等。少时甚贫，然而在祖父与父亲的影响下，很早便“窃窃喜书”，并勤于自学。从17岁起，专攻书法篆刻艺术，长期一笈横肩，浪迹天涯。每至一处，必“搜求金石，物色豪贤”，勤学苦练，博采众长。终于名动京华，艺惊时贤，成为著名皖派书法篆刻艺术的巨擘。“四体书具为国朝第一”，诗文亦颇有名。完白山人一生教书卖字，清贫倔强，终老布衣。曾自刻一印：“胸有方心，身无媚骨”，是其最好的写照。一度曾入武昌湖广总督毕沅之幕，然而日与“群蚁趋羶，阿谀而佞”之辈为伍，久之乃觉恶俗难耐，“郁郁殊甚”，终坚辞而别。毕沅

挽留不下，转以四只铁砚相赠。山人携以归里，构新居而纳之，并额其新居曰“铁砚山房”。山人后代，悉居于此。

“铁砚山房”传到第五代，即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（字叔存）这一辈时，出现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。以蛰兄弟姐妹一共 10 人，男女参半。这在邓家的历史上可谓一大喜事。因为在此之前，“铁砚山房”一直是薪火单传。邓稼先有两个伯伯，两个叔叔，另外还有好几位姑姑。而且，他的这些长辈们多学有所成，业有所精，被日后的小稼先引为自豪和学习的榜样。当时已值清末民初，国门始开，有识有志之士纷纷出外求学，或西赴欧美，或东渡日本，“留洋”之风盛行。早就有“游学”传统的邓家子弟，此时更是欣逢其会，争相效尤。邓以蛰先后留学日本、美国。攻读西方哲学、美学，通数门外语。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，后又曾短期出访过欧洲的意大利、比利时、西班牙及英、法、德诸国。著有《艺术家的难关》、《西班牙游记》等书。邓稼先的二伯邓仲纯、五叔邓以从两人都曾留学日本。四叔邓季宣则是留法的。邓家的这些后代，其游踪所至，即便那位自封为“笈游道人”的先祖也要“望洋兴

叹”了。

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(juān),亦为怀宁人。善良温顺,勤俭持家。她与邓以蛰共生有三女二男,除长女夭折外,还有邓稼先、稼先的大姐(实为二姐)邓仲先、三姐邓茂先、小弟邓携(zuì)先。邓稼先是最后一个出生在“铁砚山房”里的邓家后代。而且,在他降生后八个多月便由母亲带到了父亲谋生的北平,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然而邓家世代相传的家风和学风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这其中,既有先天的遗传,更有后天的培养和熏陶。单从日后邓稼先那一口不够标准的普通话里明显的安庆腔,便可知道他与故乡有着何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《清代学者像传》上有一幅“完白山人扶杖图”,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后邓稼先的一些相貌特征:方头、大脸、浓眉、直鼻、淳朴可亲的笑容……不止相貌惊人地相似,而且,随着年龄的增长,邓家人忠厚、朴实,外憨内秀的品格特征,也逐渐在邓稼先身上显现出来。完白山人《与侄书》书:“父母不足恃,自己气力不足恃。可恃者,读书明理,存心忠厚而已。”从这段短短的文字里,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旧时一位正直、善良

的布衣学者的鲜明形象，而且可以找到一位新时代纯朴、高尚，勤奋、爱国的知识分子的生动影子。邓家世代相传的“家风”，正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。

与邓石如一样，邓稼先一生也只活了62岁。1986年7月，在生命最后的日子，邓稼先曾向他的亲属吐露了最后的心愿：死后能把骨灰送回故乡，与母亲安葬在一起。

二、古都

1925年的初春时节，北平（即后来的北京）西城丰盛胡同北沟沿一座普遍的四合院里迎来了一个新生的婴儿。

这儿远不是一座高级的宅院，但却十分宽敞和宁静。前院有一棵古老的龙爪槐，它如同一把遮荫的巨伞。后院却植着一株丁香，每当夏季，树上挂满了那淡紫色的花瓣时，浓郁的清香便会在院中弥漫开来，令人如醉如痴。就在这个院中，邓稼先度过了他幸福的幼儿与少年时代。

少时的邓稼先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，机灵、好学。同时，他又是一个特别爱玩的孩子。而且，

他玩起来还十分专注、入神，甚至忘形。以致于常常显得很调皮和淘气。日后的邓稼先夫人许鹿希教授曾如此评价她的夫君：“儿时的邓稼先虽然特别淘气，但很聪明。古文背得烂熟，数理化也学得很好……”事实上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好学与爱玩这两种秉性伴随了邓稼先整整一生。

这样一种个性的养成，与父亲邓以蛰独特的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。

邓以蛰教授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，在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中，积极提倡新文艺。他与胡适是老朋友，因他在家中排行第三，故胡适常常称呼他“老三”。后长期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中国书画的美学理论，曾发表多篇论文和著作，见解新颖、深刻、独到。当时，他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，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主任。

邓先生学贯中西、知接今古，思想活跃、兴趣广泛。既提倡新知，亦弘扬旧学。既酷爱西方古典音乐，亦嗜好传统的京剧……在教育子女方面，同样主张“兼收并蓄”、“中西合璧”，并注重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个性。稼先5岁时，父亲亲自为他进行传统文化的开蒙。不久还送他进了一家私塾，正式接受“旧学”的教育。以后，又送

他进了新式的小学。在新学堂里，稼先学的是国文、算术、手工、常识等课程，但放学回家以后仍要接着背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尔雅》等四书五经中的段落。对于聪慧敏捷的稼先来说，背书并不是一件难事，因背不上来而吃板子的经历大概是极少发生的。只是在成年以后，再来回想当年自己穿着小长袍站在父亲面前摇头晃脑地背诵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”时的情形，不免觉得有些滑稽可笑。即便是在当时的有些人看来，在民国二十年还背这些“老古董”式的文章，似乎也有些不可思议。就有这么一次，父亲的一位老友、北大的张奚若教授来访，恰巧遇上稼先背书的这一幕，就连他也感到有些诧异了。但邓先生却自有主张，他认为祖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，应该让下一代了解并继承下去。同时，邓先生也鼓励孩子阅读外国文学的名著精品，他自己在这方面的阅历就很丰富。稼先在上小学时，就阅读了莫泊桑、狄更斯、屠格涅夫、陀斯妥也夫斯基等名家的著作。上高中时，他已能直接阅读外文小说，阅读的范围也更加扩大。邓稼先上中学以后开始对数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父亲看到以后觉得非常高兴，并热情地加

以鼓励和支持……所有这些，都为日后稼先的成才之路指明了最初的方向。

儿时的邓稼先，“玩”的本领是很高的。什么放风筝、抖空竹、玩弹球之类，在小伙伴中他总是玩得最好，技压群“童”。而且，往往还玩出新花样。比如抖空竹，一般的空竹玩得不过瘾了，就找带把的茶壶、茶碗盖来玩，照样抖得溜溜地转。但他最喜爱的还是玩玻璃弹球，小小的、晶莹美丽的玻璃球，他不仅玩得特棒，还热衷于收藏，视为珍宝。他和一帮小伙伴们玩起弹球来，常常迷得忘了时间，直到天黑看不见了，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回家。此时，往往会受到母亲的责备，可是到下一次，他照样忘了时间。稼先的玩耍，虽偶尔因为过分或闯了祸，会受到父母的训斥，却从未遭到禁止或限制。邓教授从来不主张用严规厉矩来束缚孩子的天性，只要不闯祸，只要完成了功课，就让他们尽情去玩。他认为，从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学到知识，得到锻炼。他在国外访问时，曾在给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我们是小孩的亲爱的父母，并不是他们的阎王。”由于父母的开明，儿时的邓稼先一直生活在一个宽松、民主，充满亲情与温情的家庭环境中。他也终身保留着爱

玩的天性。以后当他在美国留学，与少年的友伴团聚时，仍未忘记要复习一下玩弹球的旧课。当他成为核武器研制的理论部主任，以至“两弹”的功勋之后，仍热衷于在极度紧张的工作之余与同伴们一道打牌、下棋，甚至打闹、嬉戏，弯下他高大的身驱，和大家玩“跳马”。

1931年“9·18”的炮声，打破了邓稼先平静、安宁的少年生活。到这一年的11月，日寇完全占据东北三省。紧接着，又将魔爪伸向华北。1935年12月，北京爆发了震惊全国的“12·9”运动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和汉奸卖国行径。青年学生冲破反动当局的封锁和镇压，不顾流血牺牲的危险，坚定地走上街头，示威、请愿，悲愤地喊出了：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……”这一切，对于邓稼先幼小的心灵来说，是另一种方式的，也是更为重要的启蒙。

就在这一年：1935年，邓稼先小学毕业，考进离家较近的志成中学。第二年，又转入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——崇德中学。

崇德有一个良好的英语环境，英文课全由英国女教师讲授。邓稼先的英文在童年时就受到父

亲的教益，入崇德以后他更加努力刻苦地学习，因而进步很快，为以后进一步深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对理科课程的兴趣亦是与日俱增，尤其是数学。在别人看来似乎非常枯燥的数学公式，对于他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。演算数学题总是使他全神贯注，如醉如痴，就如同他以往玩弹球一样。常常做题直到深夜，写满了算式的草稿纸洒得满屋都是。看到稼先对理科的数学如此痴情，父亲感到由衷的高兴，他特地请了师大附中的一位数学老师到家里来为稼先进行专门辅导。自此以后，他的数学更为精进。此时的邓稼先还不知道，数学对于他这个未来的理论物理学家来说，将是何等的重要。

邓稼先在崇德的另一件有意义的事，是与杨振宁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关系。杨振宁之父杨武之也是清华的教授，而且也是皖籍，合肥人。杨武之早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，获数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，任教授，并长期担任系主任，是中国现代数学的老前辈之一。两家的家长本来就相识，自两个孩子结识以后，过从更密。振宁于1933年入崇德，他长稼先两岁，学龄也高两级，但两人相处却非常融

洽。说起来，杨振宁的名字还跟邓稼先的故乡怀宁有关。当1922年杨振宁出生时，父亲杨武之正在安庆的一所中学里教书，当时怀宁县的治所在安庆，故安庆又称怀宁。杨先生便为自己新生的儿子取名“振宁”，以示纪念。两位少年均是聪颖好学之士，志同而道合。加之稼先憨厚，不善言辞，振宁则能言善辩，爱打抱不平，从而在性格上亦互为补偿、助益。有时，稼先在课余娱乐时受到一些同学的捉弄或揶揄，振宁总是挺身而出，主持公道，为他摆脱困境。在学习上，尤其是理科方面，振宁对稼先的帮助和启迪也很大。两人常常在一起背唐诗、背外文，或是海阔天空地神聊。有时也在一起玩弹球、打壁球，玩得痛快淋漓，异常开心。这种纯洁、密切的学友关系，以后在西南联大，在美国，虽因世事变迁而时断时续，却一直温馨如故。

1937年7月7日仲夏之夜，日寇在华北驻屯军一部，以演习为名，借口一名士兵失踪，蛮横地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。在遭到当地中国驻军的拒绝后，日军竟悍然炮击宛平城。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，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命令，奋起抗击，在卢沟桥打响了抗击日寇的第一枪。从此，拉

开了中国近代史上“八年抗战”悲壮长剧的序幕。8月10日，北平沦陷。已年满13岁的邓稼先，永远记得这国耻的一日：上万名驻京官兵，在上司“不战不和，不降不走”的荒唐命令下白白地断送了性命。司令官自己却从西直门逃出了北平。日军仅以极小的代价，便占领了北平城。接踵而至的，便是烧、杀、淫、掳、污辱、奴役。西郊的海淀、黄庄，直到白石桥一带，阵亡将士与无辜百姓的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……生长于礼仪之邦，温柔亲情之乡的邓稼先，陡然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，无法不在心中留下终生难灭的烙印。

“7·7”事变之后，清华南迁，与北大及天津的南开大学先在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，继又转至云南昆明，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父亲邓以蛰因肺病严重，时常咯血而无法南下，故全家滞留北平。此时，崇德由于是英国教会学校，故暂时尚得以继续开学。然而，孤处于沦陷区内，时时受到日本人的骚扰和恶劣环境的影响，又如何能够静下心来读书，上课？振宁也随其父去了昆明，往日的好时光似乎永不会再来，有的只是说不尽的仇恨、耻辱与怒火。沦陷以后的北平，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，百姓们受尽了屈辱。邓稼先